

陈独秀 刘少奇
李大钊 瞿秋白
毛泽东 张闻天
周恩来 任弼时

中华民族 杰出人物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第十集

金再及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DK10/19
01
(京) 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马文莉

封面设计：邓中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10)/金再及主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12

ISBN 7-5006-1660-0

I.中…II.金…III.革命领袖-生平事迹-中国IV.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506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房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15.5印张 320千字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0.60元

编者的话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作出过贡献，得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为了帮助广大青年熟悉和了解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继承和发扬我国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这一套传记读物。本书是其中的第十集。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十集，介绍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任弼时的事迹，是一本通俗的历史人物合传，由金再及同志主编，唐宝林、朱成甲、李捷、廖心文、陈绍畴、陈铁健、程中原、杨瑞广同志撰写。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目 次

陈独秀	唐宝林	1
李大钊	朱成甲	55
毛泽东	李 捷	103
周恩来	廖心文	188
刘少奇	陈绍畴	268
瞿秋白	陈铁健	331
张闻天	程中原	390
任弼时	杨瑞广	440



陈 独 秀

唐 宝 林

一 游戏人生少年狂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十月九日，在长江中游北岸凸弯处，经历了千百年波涛冲刷的安徽重镇安庆，又诞生了一个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巨大足迹的“狂人”。他就是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另有三十几个笔名、化名，如三爱、只眼、志孟、撒翁、顽石、雪衣、虬儿、孔甲等。

陈家是书香门第，但功名从未显赫过。祖父是候补知县，伯父是候补知州，皆无实缺。父亲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中秀才后，屡困考场，终身不得志，只在苏州窦军门家中任塾师。唯有叔父考中举人，去东北当了一个知县。所以陈独秀自称生在一个小户人家。而在他两岁时，父亲就病死在苏州窦军门家。

这样的家庭唯一崇尚的就是科举。读书做官就是他们的训子之道。从六岁开始，陈独秀即由祖父教读。由于他有一点小聪明，老人对他期望甚高，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让他读完。可是聪明者往往个性强。陈独秀不喜欢这些经书，尤怕背《左传》。于是每当背书背不出来时，祖父就生气。而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的是，孙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背后又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泪。可是，她对儿子不像祖父那样悲观，她总是用好言劝说：“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个举人，是他生前的一桩恨事！”

陈独秀见了母亲的眼泪倒哭出来了。所以他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吃软不吃硬，刚烈而又温情，陈独秀从小就表现出这种个性。

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出于这种个性，也许是对世俗的无知，陈独秀对生活中许多他认为不合理或束缚人的传统，

有一种叛逆的心理，并进行嘲弄和反抗。

当时迷信盛行，人们对鬼神敬畏，各种迷信活动神圣而严肃。陈独秀却不以为然。一位专事“传达鬼话”的阴差先生经常到他家，说他家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纸钱银锭烧给他们。母亲明知这钱必定落入他的腰包，还是照办。有一天，这位阴差先生又到陈家，张大嘴打一个呵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胡话，当时称为过阴。陈独秀气不过，就跑去约了十多个孩子，从前后门奔来，同声大喊某处失火了。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一个小小呵欠，便回到阳间来了。

陈独秀当时最大的叛逆行为是对科举的不严肃态度。他十一岁那年，祖父去世。接着请过好几位塾师，他都大不满意。没法子，就由已是秀才的大哥教他。这使这位因忠厚老实而被称为“阿弥陀佛”的大哥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陈独秀习八股，一面他又知道弟弟不喜欢八股文。大哥就教他读《昭明人选》，伪装用功，迷惑不识字的母亲。就这样，熬到十八岁，陈独秀硬着头皮去应科举。

凭着小聪明，陈独秀勉强通过了县考和府考。院试时，宗师出的题目是从《孟子·梁惠王》句子中摘出拼凑而成的截搭题：《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陈独秀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对这个关系到他人生命前途的事情，开了一个大玩笑。可是，“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独秀中了秀才，母亲乐得几乎掉下了眼泪，在亲友邻舍中，也引起了轰动。向来被绅士们瞧不起的小户人家，连续出秀才，而且这位新秀才还那样年轻，前途无可估量。于是对他都另眼相看，并造出种种神话，说陈家祖坟的风水是如何如何好！说江边迎江寺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枝笔等等。一些富家大户纷纷前来提亲。

这时的陈独秀已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才知道甲午年的战争日本把我们中国打败了，英、法、俄、德等国都在欺侮中国，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康有为已多次上书朝廷，主张维新改革，变法图强。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忽然觉悟这些年来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这是多么要不得。他开始崇信康梁维新思潮，与安徽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经常在一起聚会，“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亦被乡里督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转年，陈独秀在母亲的催促下，到南京参加乡试。若考取举人，就可以做官了。这次，命运却不再跟他开玩笑，他落榜了。但是，他在考场上看到考生们为争功名利禄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丑态，却使他“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

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于是，陈独秀实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

这时的陈独秀，保持了不满和改革现状的思想，抛弃了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乡试后，他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考察，于这年冬，撰写出至今发现的、以石印竖排本形式印发的、他的第一部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此作洋洋七千字，广征博引，以精炼的文字和详细的数字，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复杂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渚的分布、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参照历代战例，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向清政府提出了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以应内乱，御外侮。文中洋溢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字里行间显示出他的广博学识，实是当时维新政论中少有的佳作。

二 咤叱风云任翱翔

母亲从几家提亲者中，最终选择了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大众。当时陈独秀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因此他未在婚姻大事上违抗母命，从南京回来后，就稀里糊涂地与高大众结婚，第二年即得长子陈延年。

但是，高大众是一旧式女子，没有文化，遵行三从四德，只望丈夫能封妻荫子，安居乐业，与陈独秀的激进意识格格不入。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后来陈独秀留洋，欲借其金镞作游资，她坚决不肯。二人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所以，陈独秀后来坚决反对包办婚姻，撰文列数其种种罪

恶，但他又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性解放，三次追求新欢；其中固然有争取真正爱情的因素，但亦有喜新厌旧之嫌，因此不少人对他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不严肃作风多有微词。而高大众只有独饮无爱情而又要敬老育幼之苦。这是旧社会婚姻不幸妇女的普遍悲剧。

康梁维新运动因遭到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很快失败。陈独秀因在安徽亦有鼓吹，被追捕，就逃到东北叔父兼嗣父陈昔凡处。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陈独秀亲眼目睹沙俄强占我东三省时烧、杀、淫、掠之暴行，犹如见到母亲受欺凌，感到奇耻大辱。受此刺激，他开始思考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企图从中寻找中国被外国欺负的缘故。他说：“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县，各不相下”；“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

于是，陈独秀便在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十月赴日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年底，他参加留学生组织的“励志社”。该社以勉励学业，联络感情为宗旨。但他见该社曹汝霖、章宗祥等接近官场，不久即脱会。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留学生中激进分子交往，阅读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书刊，迅速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春，陈独秀回国，在安庆，联络潘赞化、柏文蔚等青年，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

知，煽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九月，因这些活动被通缉，他再次赴日，进成城学校学陆军，并联络张继、蒋百里、苏曼殊等，成立“青年会”，宣称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

冬去春来，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又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天，鉴于清政府委派的学监姚煜阻碍中国留日学生的正当要求，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张继抱姚煜的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割发代首，使其威信扫地。陈、张、邹即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这时正值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东京、上海的留日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独秀即回安庆联络同志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五月十七日在藏书楼召开演说会，冒雨参加者三百余人。陈独秀在演说中痛斥沙俄侵略行径，指出当今“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在此情形之下，“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演说毕，陈独秀正式宣布组织“安徽爱国会”，并拟定章程，宣称其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并决定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先谋南方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

陈独秀等上述反清活动，震动当局。江督端方电令安徽统领韩大成严密缉拿。陈独秀得友人吴汝澄密报，连夜逃亡上海。八月，陈独秀与章士钊等合作创办《国民日报》，二人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章曾作诗曰：“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而陈独秀则经过

数年磨练，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八月十七日作《题西乡南州游猎图》诗曰：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
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这年底，《国民日报》因受当局压迫，销路断绝，经费短缺而停刊。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在老朋友汪孟邹经营新书报和教科书的科学图书社楼上，办起了《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不仅任主编，撰写主要文章，还负责全部排版、校核、分发、卷封、付邮等。他后来回忆：“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安徽俗话报》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三月创刊，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代派所，声振全国。其内容借报道时事、介绍知识，暗中鼓吹革命。陈独秀在报上共发表五十篇作品，有论文、诗歌、小说、历史故事等，以流利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谈天说地，纵横驰骋，如天马行空，但又紧紧围绕着反帝反封建、宣传爱国科学与民主的主题。如《瓜分中国》一文，在叙述了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形势后，指出：“大家仔细想想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做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究是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他认为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这“便是亡国的原

因”。他又指出捍卫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反对君权，国家大事“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是中国衰亡又一原因；国，“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此外，陈独秀还宣传反对包办婚姻、敬菩萨等封建恶俗。

三 “孤愤酸情欲与谁”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秋，陈独秀曾应邀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试验炸药，研究暗杀。他还与安徽革命志士吴榭联系，参与吴谋刺清廷大臣的策划。一九〇五年九月，吴榭在北京车站谋炸清廷出洋五大臣失败牺牲，陈独秀曾参与其后事处理。

这时，陈独秀为继承烈士遗志，急于付诸行动，于是停办《俗话报》，只身遍访江淮义士，发起成立了“岳王会”，自任会长。后来，岳王会以芜湖为总会，在安庆、南京设分会，常恒芳、栢文蔚分任二分会部长。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如熊成基、倪映典、吴旻谷等，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陈独秀本人从未加入同盟会。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春，安徽巡抚恩铭闻陈独秀上述活动后大怒，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即再次亡命扶桑。接着，不断传来国内徐锡麟刺杀恩铭，并与秋瑾共同策划的皖、浙两省起义失败后牺牲，以及孙中山领导的潮

州、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陈独秀受到莫大刺激。联想几年来自己坎坷的经历，他陷于深深的苦闷、彷徨和孤愤之中，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下这无限的惆怅。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他游日本日光山，面对高悬一千尺的华严瀑布，感叹道：“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表示了对几年来牺牲的战友深切的思念和哀痛。

翌年，他与苏曼殊唱和的《本事诗》又吟道：“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但是，陈独秀并不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绝不消极隐退，仍时时砥砺自己不忘革命大业：“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而且，他要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精神，忍受“饥来啮坚冰，荒岩坐晨夕”；“炎威灭千春，忍令肤寸瘳”等种种磨难，作不息的奋斗。他坚信挫折和黑暗是暂时的，革命终将胜利：“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

果然，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新的革命高潮终于到来。这年十月，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推动当地党人响应，并写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使省垣官吏闻之悚然。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安徽的斗争，因此，孙毓筠当上安徽都督后，陈独秀应邀到安庆出任都督府秘书长。

孙毓筠少爷出身，贩食鸦片，不理政事。陈独秀执掌大权，正好一展抱负。他提出铲除旧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

一整套方案，以猛药除痼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可惜欲速则不达，遭到群僚抵制，不久即被迫辞职。

当时袁世凯与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十分激烈，局势动荡。一九一二年四月，孙毓筠辞都督职后，柏文蔚接任。陈独秀又应邀先后出任都督府秘书长、顾问、秘书等职。他与柏文蔚决定，安徽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进行斗争。一九一三年六月，柏文蔚响应二次革命。陈独秀即协助制订反袁大计，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严词声讨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

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系安徽都督倪嗣冲指控陈独秀为“蓄志谋叛之犯”，通告拿办。陈独秀再次亡命上海，其安庆的家被查抄。

反袁斗争失败后，陈独秀由于一时找不到新的出路，又陷于更加严重的彷徨和苦闷之中。他本拟闭户读书，在“亚东”以编辑为生。但如他当时致友人信说：“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再看全国，“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全国人民“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并发牢骚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凡此种种忧患，又把不甘寂寞的他抛进更加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中，从而开创出一个历史新纪元。

一九一四年七月，在上海陷于绝境的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到日本去协助编辑《甲寅》月刊。这是一本当时有重大影响的反袁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年十一月，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笔名发表在《甲寅》上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文章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即没有建设近世国家的自觉心；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所以，文章在列数袁政府的罪恶后，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是作者十几年来为救国为革命奔波又不断受挫后的总结，吐出了郁结心中已久的极度的苦闷，同时也标志着对新道路的探索，即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当时政坛上热烈争论的恢复国会、建设共和、实行宪政，而在于提高国民的“自觉心”。如何提高？还不清楚。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就等于回答了一半。但是，陈独秀在文章中表现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的国家的心情，由于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及“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误解。当时就有十余封信投向《甲寅》，诘问斥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李大钊也撰《厌世心与自觉心》，批评陈独秀“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但是，数月以后，当章士钊发表文章来回答这些抗议信、为陈独秀辩护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许多人对于陈的观点，由原来的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梁启超就是一个。他说如今“举国人明眼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质言耳”。所以章士钊盛赞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